

【徽学研究】

明清宁国商人新探*

董家魁

(安徽师范大学 图书馆, 安徽 芜湖 241003)

关键词: 明清; 宁国商人; 徽商

摘要: 宁国商人的经营足迹遍及省内外, 在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加速经商地区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宁国商人与徽商并称“徽宁商帮”, 是明清时期安徽境内知名商帮。二者有着相似的兴衰历程, 经营中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密切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48; K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3)01-0036-07

New Discussion of Ningguo Merchant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ONG Jia-kui (Librar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ingguo merchants; Huizhou merchants

Abstract: Ningguo merchants' managing trails spread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and sideline products commercializ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their trading region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Ningguo merchants and Huizhou merchants are known as "Hui-ning merchants", and they were two well-known merchant groups in Anhui Provinc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y had the similar proceeding of rise and decline, an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of cooperating and competing in managing.

明代中期起, 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相继在国内兴起。其中, 宁国商人是兴起于皖南地区的一支重要商帮, 常与徽商并称为“徽宁商帮”。一般认为, 宁国商人是指明清时期宁国府所辖的泾县、旌德、太平、宣城、宁国及南陵六县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它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 形成于嘉靖、万历年间, 鼎盛于清康熙、乾隆至嘉庆之际, 衰败于清咸同年间。揆诸明清商帮史论著, 宁国商人研究虽有部分成果, 例如: 戴玉、范金民《宁国商人初探》,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李甜《“徽宁商帮”初探》, 载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亚洲: 文化交流与价值阐释》,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沈喜彭等《清代宁国商人与社会公益事业》, 《兰台世界》2012年第6期; 拙文《清代宁国商人的经营策略》,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但其兴衰历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以及与徽州商人之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仍较为薄弱。本文对此问题试作探讨, 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宁国商人的兴衰

宁国商人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 形成于嘉靖、万历之际。成化以前, 宁国府县之人多以务农为本, 仅有少数人经商, 他们“力耕织, 薄商贩, 敦俭朴”^{[1]卷9《风俗》}, 过着勤劳简朴、自给自足的生活。然而到明弘治年间, 宁国府人纷纷走上商贾之路。如旌德“弘治以前, 人心甚古, 乡里之老有垂白不识县官者; 以后渐变渐靡, 舍本而务末”^{[1]卷9《风俗》}。泾县在弘治以前“男勤于耕, 女勤于织, 鲜事商贾, 尤贱工作”, 嘉靖时则“商贾亦远出他境”^{[2]卷2《风俗》}。此后更是“操奇赢, 走四方者多矣”^{[3]卷4《风俗》}。嘉靖、万历

*收稿日期: 2012-06-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094)

作者简介: 董家魁(1980-), 男, 安徽阜南人, 馆员, 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徽商与明清史。

引用格式: 董家魁. 明清宁国商人新探[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1): 036-042.

时人张瀚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4]卷4《商贾纪》时人章潢在其所辑《图书编》中，更称宣、歙之间“其民尽仰机利，行贾四方，唱棹转毂，以游万货之所都而握其奇赢”^[5]卷36《南直隶图叙》。由此可知，明嘉靖、万历时期，宁国府人结伙外出经商已蔚成风气，成为继徽州商帮之后的皖南第二支商帮。

宁国商人的兴起与形成，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宁国商人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影响而兴起，《宁国府志》将此情形称为“势”，“百工技艺之人，商贩行游之徒，皆衣食于外郡，逐利于绝徼，亦势使然也”^[1]卷9《风俗》。此时，商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士之读书将以商禄，农之力作将以商食，而工而隶而释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6]卷10《江湖胜游诗序》其二，迫于生计。明成化年间，受人多田少、自然灾害、人口激增等因素影响，宁国府所辖六县人地矛盾骤然加剧。据当地文献记载，“民食朝夕饘粥不免于饥，红女终岁纺织不免于寒”^[7]102，“人皆欲有生，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8]。可以说，经商成为当时宁国府人谋求生存的唯一出路。其三，受利益驱使。经商不仅可以谋生，还可以获得“机利”，正如前文所述“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宣歙之间，其民尽仰机利，行贾四方”。上述三种因素促成宁国商人的崛起。

清康熙、乾隆至嘉庆年间，宁国商人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营地域广阔。宁国商人或坐贾或行商，他们除了在省内经商外，更多的是在省外从事商贾活动，“走贸四方，或远入黔滇间”^[1]卷9《风俗》。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宁国商人的商贸福地。“居民谋生拮据，往往经营贸易，散之四方。自京师以及各行省，而以大江南北最多。”^[9]第21册《艺文三》二是经营行业多样。宁国商人涉足诸多经营领域，他们从初期主要贩卖本地的土特产品，“客则以兴贩木材为上，下则携纸刀、花剪、漆扇、绒伞诸物走贸四方。”^[1]卷18《物产》到后来随着经商范围不断扩大，宁国商人的经营行业涉及食盐、典当、茶叶、竹木、粮食、纸张、雨伞、烟草、丝绸、医药、油、漆等方面。三是社会影响较大。鼎盛时期，宁国商人同徽商

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他们或合作或竞争，常被并称为“徽宁商人”、“徽宣商人”。宁国商人虽然在总体实力上尚不如执商界之牛耳的徽商，但是在不同地域及行业，宁国商人有时并不逊色于徽商。譬如，在芜湖、苏州、松江等地，泾县、太平两县的烟草商人十分强势；在宣纸、雨伞等行业，宁国商人有着徽州商人不可比拟的资源优势。

清咸丰年间，宁国商人开始衰微。宁国商人逐渐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天灾”，二是“人祸”。天灾方面，清咸丰元年（1851）开始，宁国府境内自然灾害频发，洪水、蝗虫、瘟疫等交相肆虐。如咸丰年间，宣城县境内“水灾相继、疫病大起，以致境东南一带，十室九空、人少烟稀，土地荒芜、满目疮痍。”^[10]2又如当时的宁国县，“瘟疫后，宁国土著人幸存者十不及一。”^[11]743人祸方面，咸丰、同治年间，清军与太平天国军在宁国府境内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宁国商人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均受到了致命摧残。以旌德县为例，咸丰六年（1856）始，旌德初遇旱涝瘟疫，复遭清军围剿太平军的兵燹洗劫，结果“壮丁存者不及十分之二，老弱妇女百不存一”^[7]87。从“咸丰十年，突遭兵燹，郡人流寓，苦无公所”^[12]383等材料来看，宁国府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大体与旌德类似。宁国商人的衰微可以从旌德江氏商人的命运中略见一斑，“吾旌自设县以来，元明曾遭兵燹，而蹂躏不深……道光末年，予族设质库外埠者六十余家，商店则如恒河沙数。辛酉之难，百无一存矣。”^[9]第21册《艺文三》当然，随着清末通商口岸的开辟，商业竞争加剧等因素也加速了宁国商人的衰败。

二、宁国商人的贡献

商人是商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者。明清时期，宁国商人同徽商一样活跃于商业界，其经商足迹遍及省内外。他们在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加速经商地区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转销货物，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

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这自然离不开商人的推动。宁国府地理条

件特殊,这里盛产大米、茶叶和竹木等农副产品。宁国商人无论是在本地区收购产品以出售,还是远贾他乡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其结果都起到了转销货物,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的作用。早在明代刘洪谟所撰《芜关榷志》中就有记载:

新庄河(属宣城县,距庙埠四十里,庙埠亦属宣城交界)总甲壹名,查庙埠斧号。旧例,竹木从旌德、宁国二县西津渡出路,由双桥东溪过宁国府,而乌盆沿,而竹丝沟,而庙埠,而油榨沟,而陈村湾,方至新庄河。此河一通水阳、塘沟、黄池,一通建平南湖。凡竹木至此,验有工部斧号,方准过关,如无斧号,即系走水。商人竹木泊庙埠上,即投单请斧号,本厂差二役查点行号,报厂定税。如往芜湖、高淳卖,过新庄河,过水阳,过塘沟,总甲照前斧号放行。万历二十六年,主事钱竖庙埠课旗一面。万历二十九年,主事茅给告示严查。^[13]卷上《管榷事宜考》

这段资料说明,宁国商人将本地区的竹木贩运出去,沿途要交纳关税。又据史料记载:“厘金局多设于货物流通要津之地,因旌、泾、太、石、黟、歙诸县,盛产竹木茶炭等山货,大部分经青弋江水道运出,当时便在青弋江中游之马头镇设一厘金局,榷征竹木茶炭等货税收。”^[14]⁵³这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宁国商人抑或是徽州商人,把皖南的旌德、泾县、太平等地的特产竹木、茶叶贩运到外地,并转化为商品销售出去。

具体来看,泾县的榔桥镇,早在明代中叶,已成为泾县东南乡商贾和徽商运销木材、茶叶、蚕丝等商品的集散地。在把本地丰富的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过程中,商人尤其是本地的宁国商人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泾县商人徐辉堂就是个典型,他于清道光年间,经常在泾县、太平山区一带收购茶叶贩运到南京销售。泾县、太平的茶叶味香色美,深受南京人欢迎,他生意愈做愈大。后来又在南京三坊巷口租赁一处三进店房,于同治三年(1864)开设“徐源记茶栈”。经营茶叶零售业务,并吸引泾县、太平的临时茶叶客商和茶农存放茶叶,还介绍推销茶叶,提取一定的栈厘。由于对顾客和茶商、茶农服务周到,生意日益兴隆。^[15]³³⁻³⁴这为泾县的茶叶外销做出了贡献。旌德县的货物转销情况,据该县方志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本县人口发展到最高峰,

“人有余而土不胜”,半数以上的粮食均由商贾从芜湖、湾沚等地筏运以济,旌德米市也应时而兴。^[7]¹⁰²清末民初,工业品和南北杂货分别从绩溪县临溪、歙县深渡和泾县、芜湖输入。^[7]³⁶⁰这些商品的购销,主要依靠本地商人来完成。另外,商品运输线路“旌绩驿道”也可得到启示,自唐至清,此道为徽宁二府经济贸易、官员往来的主要通道之一,公文传递频繁,货物运输不息。^[16]⁸⁰这其中必然有宁国商人的积极参与。宁国县的首镇河沥溪,商业比较发达,这里既有泾县人经营的各类商号,又有绩溪商人开设的店铺。那时的河沥溪正街可谓商贾林立,是皖南山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当地的竹、木、柴、炭、茶叶和土特产品要运出去,日用百货、布匹等要从外地运进来,都需要有宁国商人的经营活动。清代,宁国县商业市场形成,宁国商人把本地所产竹木、柴炭、桐油、表芯纸等特产外销,换进食盐、布匹等所需商品。如宁国县商人叶德松,光绪六年(1880)在江苏溧阳南门河沿“德丰”木行当学徒。三年满师升为水客(即采购员),前往江西、汉口等地采购木材。数年后升为经理,经常赴江西、湖南、湖北采购木材远销上海、南京一带。^[17]⁷⁷这些商业上的举措,无不促进了各地农副产品向商品转化。

(二) 开拓市场,加速经商地区商业发展

商人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无论是坐贾还是行商,其经营活动都是为了开拓市场,从而加速经商地区的商业化发展。宁国商人一部分在本府境内经商,一部分到外地经营,推动了经商地区的商业发展。

1. 坐贾家乡,推动本地商业发展。在南陵县,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北商贾渐多,城关经商的多为泾县、旌德、太平、徽州等地商人。贸易物资大都是地产的稻米、木材、竹器等。至光绪十四年(1888),该县城关有大小商铺300多家。^[18]³⁰⁵清末民初,徽帮、泾帮商人来南陵经商,江北各地手工业者亦到此谋生,故商业逐渐兴盛,手工业匠铺日益增多。^[19]⁸⁴在宣城县,清末始有来自毗邻的泾县、旌德、太平、南陵各县以及安庆、庐州、徽州等地的客籍商帮入境,在县城和水阳、湾沚、孙埠、水东、沈村、周王、寒亭等集镇定居经商,促使商业重新兴起。至民国初年,宣城县城区商业活跃,店铺鳞次栉比,成为宁国、泾县、郎溪、广德等县茶商

集聚之区，也是粮食、茶叶、竹木、山货集散地。当时，独资经营以“徽州帮”、“泾县帮”居多。民国六年（1917），泾籍商户成立“旅宣泾帮商业公所”。^{[10]336}在旌德县，明末清初已有很多人外出经商，自乾隆以后，掀起经商热，经商成为时髦的职业。当时本县北乡通泾县之徽水货运十分繁忙，仅三溪古渡就有筏户八百，竹木土产水运至芜湖，县内贸易由此兴盛。旌阳、三溪的布店、货栈、钱庄、当铺盛如都市，商号满目，店旗交错。庙首、杨墅、朱旺村、大礼村等都是繁华的集镇，“穷乡僻壤之区，均成市廛林立之所”。旌德人“因商致富”，特别是巨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资本投资家乡。^{[7]4}在宁国县，清末民初，县内的经商者大多为徽州、旌德、泾县等外地商人。商户多集中于县城和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的港口、宁墩、胡乐、东岸等较大集镇。县城的河沥溪、城里、西街是主要商业区。^{[11]373}据《宁国县商业志》记载，光绪年间先后在河沥溪兴办的大型综合商店有：“德隆新”“春和”“吴义成”“吴同亨”“吴同春”，计五家。在城经商者五方杂处，其中以徽商及旌德、泾县商人居多，故有“无徽不成镇”，“无泾不成集”之说。

以上所述反映，宁国商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本府所辖县境内从事商业经营，他们与徽商等一起发掘本地的商机，共同开发家乡的市场，为推动本地区的商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行商他乡，促进外地商业发展。大量的史料记载，宁国商人在外地开辟了许多的商业市场，取得了一定的业绩，为经商所在地区的商业化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又以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的商人表现突出。

如泾县商人，自明成化、弘治始，已是远出他境，赢走四方。清代至民国中期，泾人外出经商者足迹遍及十八行省，宁、沪、苏、浙、赣、鄂、湘、粤及沿江各地商埠，均有泾商开设的宣纸栈、发行所、丝茶行、烟行、竹木行乃至盐号、钱庄、典当行业，且有转而兴办纱厂、面粉厂等民族工业者，形成“泾帮”商系。^{[20]306}胡朴安撰《泾县乡土记》云：“泾人在外经商者约计比居本邑经商者多三分之二，是泾邑商界特色也。”^[21]《安徽第九区风土志略》也载：泾县人“长于经商，（南）京、镇（江）、沪、汉（口）诸大埠，无不有泾帮之称”。这些都反映了泾县商人在外地商业发展中的影响和地位。旌德商人

除了在本省境内从事商业活动，更多的则是远贾他乡，在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河南等地区经商，这必然促进外地商业的发展。据《江氏宗谱》节录江希曾《旌川杂志》记载：“吾旌自设县以来，元明曾遭兵燹，而蹂躏不深。故生齿繁，而谷不足食，每年必由湾沚运米以济。居民谋生拮据，往往经营贸易，散之四方。自京师以及各行省，而以大江南北最多。道光末年，予族设质库外埠者六十余家，商店则如恒河沙数。”^{[9]第21册}这段材料反映旌德江氏商人在外地经商的地域之广，并取得较大成功。太平商人在外地经商者很多，如谢余庆，咸丰间“设米肆于新安”，同治初又“贸易和州”。清人谢燮敬，“开设衣服庄于江苏之高淳县”。林之楸服贾汉皋，“今汉镇得有花布、茶叶两帮，亦楸首倡之功也。”还有光绪年间的苏国华，未弱冠助其父怀之公经营商务，以振兴实业为己任。他感慨中国瓷茶业之不振，于是倡议创办有江西瓷业公司、江宁茶业研究所等组织。^{[22]《人物类》}这些都说明太平商人在开拓外地市场、推动经商地区的商业发展中，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三）热心公益，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商人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阶层，不仅要推动经济发展，还应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商业资本，还有热心公益事业的善行懿德。宁国商人在经商过程中或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资和参与地方公益事业，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修桥铺路，方便行人商旅。宁国商人在遇到桥断路毁等道路不通畅之时，便主动投资修桥铺路。泾县商人的善行，如查冠群“修村口大路及狮子山栈道，并建石桥”；查崇禧“在含山修路建桥”。^{[23]卷254《人物志》}查维吉“尝倡修青邑山路河桥，客无为州又独建周家砦”。^{[24]卷5《人物》}铜陵县的大通镇是商旅抵达宣、歙的必经之地，“然中隔山溪，逢骤涨，病涉维均。”乾隆十七年（1752），泾县朱氏商人独资建桥，曰紫阳桥。后来，此桥毁于洪水。嘉庆初年，泾县众商又相谋集资，“得白金七千有奇”，重建了桥梁，修葺了道路。^{[25]卷18《大通镇重建紫阳桥并修路碑记》}此外，宁国商人还设立义渡，方便和帮助行人商旅通行。如泾县曾有五位商人共同出资在县内设立了“上坊渡”。旌德商人的义举，如江一廉“牵车服贾，方起家，慨捐银二千金造黑溪长春桥”。^{[26]卷8《人物志》}康

熙五十七年(1718),旌德县三溪石壁大路被洪水冲塌,舆马负贩阻塞不前者数月。朱文焕“倡首捐资千五百金,坚砌坦夷,至今行旅称便”。^{[27]卷8《人物》}还有汪秉璧“贾汉阳积货,喜行善举,归里独力造聚金桥,并构殿阁凉亭,以为村之北障,沿溪筑堤砌路,计费千数百金”;汪上裕“在江右独立建大塘桥,费千余金,毫无吝色”。^{[28]卷7《人物》}太平商人在修桥铺路方面也有很多作为。如林贵懋迁江右,“平治路、修桥梁,凡二十年前后所费共二千金有余”。^{[1]卷末《补遗》}胡国理曾“出千金修通徽州太平路十数里”。^{[23]卷254《人物志》}又如杜伯端尝贸易徽州,对歙县岩寺等处桥梁亭路,倡捐募修;李绍祖道光时侨居贵池之唐田,倡建永济石桥三洞,费数万金;李志发同治初年营业湖北董滩口,“独资重建距董市十里之龙灯桥,行人称便”。^{[22]《人物类》}宁国商人的善行义举,不仅方便了行人和商旅,也有利于社会的有序正常发展。

2. 赈灾济民,维持社会秩序。宁国商人在遇到天灾民饥之时,往往会慷慨捐资,以解救灾民;或者不顾自己的商业利益,积极转运粮食,减价出售,以赈济灾民。如泾县商人中代表性的有,朱时庆“雍正间游楚,适汉口大荒,输粟数千石”。^{[29]卷19下《人物》}王全以服贾致饶,“康熙癸酉饥,输谷二千石以赈”。^{[23]卷252《人物志》}潘景彰道光初年经商芜湖湾沚镇,值水灾,与同乡潘周达、潘周云“倡赈难民数万,三月之久,全活实众”。^{[23]卷254《人物志》}旌德商人在灾害面前的义举,如江璐“乾隆癸亥春,雨雪联绵,米价腾涌,璐遵母命,出所藏谷,减价平糶,不足则之山溪太邑贸易以济,全活实多,至今乡邑犹称颂之”。^{[27]卷8《人物》}吕积厚贸易于江北,“乾隆丙午、嘉庆甲戌,岁大祲,叠赈里党及江北费万余缗”。^{[28]卷7《人物》}太平商人在赈灾济民方面也表现突出。如胡国理“咸丰中在汉口资送乡人避难者数千人”。^{[23]卷254《人物志》}刘时可“尝贾于浙,积有余资,辄行善举。乾隆六十年,县境旱灾,人苦饥,与弟际可、行可、仕可、圣可,由浙运米六百石助赈。”李成勳“习贾荆沙,好行善。道光二十八年岁大祲,捐资购谷数千担平糶,全活甚众。”赵希圣经商汉口,“咸丰间,县人避难于汉者几万人,希圣会同黄景星等捐巨款,筑屋百十间以居,日给粥两餐,全活甚众”。^{[22]《人物类》}宁国商人在灾害面前,自觉维护了社会秩序,有助于

社会稳定发展。

三、宁国商帮及其与徽商的关系

宁国商人与徽商是明清时期并存于安徽境内的两支重要商帮,宁国商人又并非附属于徽商的商人群体。就探讨宁国商人的商业地位而言,澄清宁国商人具备商帮属性实属必要。根据商帮史研究专家张海鹏等人的观点:“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30]前言}

宁国商人完全具备上述商帮的各项特征。首先,在宁国府六县中,除南陵县“农事最勤”外,^{[1]卷18《物产》}其余五县多以经商为业,逐渐兴起了宣城商人、旌德商人、泾县商人、太平商人及宁国县商人,他们共同构成了宁国商人这一区域性商人群体。其次,宁国商人多以血缘为“粘合剂”,以家族、乡谊为纽带外出经商。宁国府人举族经商的现象有很多,他们或“合资经商”或“合伙经商”。举族经商的结果最终形成了许多经商世家,如泾县朱氏、胡氏、洪氏、郑氏和汪氏五大经商家族,旌德汪氏家族等。宁国商人以乡谊为基础合作经商的情况也为数不少,如旌德商人张廷泰尝与同乡俞大郎合业常州,还有旌德戴氏与赵氏也是家族联合经商的典型。再次,宁国商人广建会馆、公所,作为异地联络、计议之所。如泾县商人在苏州吴县建立的“宛陵会馆”;太平商人在汉口创建的“太平会馆”;旌德商人、泾县商人在南京分别创建的“旌德会馆”和“泾县会馆”;宁国商人联合在常州创建的“泾旌太会馆”等。当然,宁国商人也是一个既亲密又松散的商人群体。

受地缘、风俗等因素的影响,宁国商人在许多方面同徽商极为相似,关系十分密切。首先,地理环境相似,二者在商界齐名而并称。宁国府与徽州府同处皖南山区,山水相邻,地理特征类似,“吾乡徽宁两郡,地处万山,田之可耕者少,人多轻去其乡,往往经商操业,毕世驰驱”。^{[31]《劝捐思恭堂添建西厅及筹备善后经费序》}人多地少,经商谋生成为两府人的首选,“宣歙多山,萃确而少田,商贾于外者什七八……沪邑濒海,五方贸易所聚,宣歙人尤多”。^{[32]232-233}宁国商人与徽商并

称的史料屡见不鲜，在碑刻和方志等文献中皆有记载。如《新建安徽会馆碑记》曰：“隶皖者郡，夹江跨淮，迤原而包山，江以南土率瘠，宣歙尤多商。”^{[12]381}江苏吴江县南的盛泽镇，“商贾辐辏，虽弹丸地，而繁华过他郡邑。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镇尤汇集之处也。”^{[12]446}又如，安徽桐城县南的枞阳镇，濒临长江，“为桐城首镇，鱼虾蕃衍，罟罟相望，舟船来往，百货俱集，民多以贸易为业，徽宁商贾最多。”^{[33]卷1《乡镇》}可见，在明清商界宁国商人与徽商齐名而并称，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

其次，生存地域毗邻，商贸活动相互交叉。明清时期，宁国府与徽州府毗邻，其中太平县与黟县相交，旌德县与绩溪县相连。宁国商人与徽商在对方府县经营的现象很多。以太平商人为例，如陈时撰、盛善继皆“服贾徽州”；杜伯端“贸易徽州”；道光时，曹天肇“商于徽之溪口，年十六往江西贩夏布，赢千余金。”咸丰年间，谢余庆“设米肆于新安”。又如谢春晖“与族人合力设商号于徽州府，治越五年，业大振。”程嘉宾“贸于黟，与人共事有管鲍遗风。”刘鸣善“与兄鸣涟贸于婺源。”苏华勳“侨居绩溪，年既久，人知其刚直，推为该县商会会长，一任八年，群情悦服。”^{[22]《人物类》}明清徽商的经营足迹“几遍宇内”，故徽商在宁国府境内从商者也为数甚众，此不赘述。

再次，商业资本雄厚，双方既是商业对手，又是合作伙伴。宁国商人由于勤俭经营，勇于开拓，后来物力既充，因商致富者所在多有。

一方面，宁国商人在许多领域扮演着徽商竞争对手的角色。如泾县商人朱华，曾在江南经商地与徽州棉商竞争，“夙夜研剖，遂悉窳要，来者山积，顷刻竟，不爽铢黍，新安人膺服，自后群从籍师资焉。”^{[34]卷27《岳西公事略》}太平商人陈仁统“懋迁徽地”，在徽州以经营酒业致富，“咸谓其富裕压全徽”^{[35]卷39《懿行传》}。对于徽商擅长经营的典当业、盐业，宁国商人也竭力涉足，且有不俗表现。如旌德商人朱德沛“经商于皖，习典业”^{[20]卷末《德沛公传》}，其弟朱德澍被委任管理上江盐业和扬州典业，经过大力整顿，“于是江宁、江浦、六合三岸销数日增，又作《典业四箴》。”^{[36]卷末《德澍公传》}道光末年，仅旌德县江村江氏一族设当铺于外埠者就有六十余家。泾县学者胡

朴安在《泾县乡土记》中描述：“朱氏族大，散居于县之东乡，纵横十余里，户口数万……世业盐，财富甲于一邑。”^[21]

另一方面，宁国商人与徽商又有合作关系。如方家仕在芜湖经商时，“徽属人之议建会馆于芜湖也，亦翁赞成之，其址邻翁业，翁让便之，而为之度划，规模制度皆出翁手，迄今徽属人犹称述云。”^{[37]卷20《安田方翁暨周程两孺人合传》}方启于康熙十五年（1676），遇一商人：“口称徽商，途顾（雇）担夫遭拐逃，行李无存，因乞盘费，翁延归，为之饮食，送钱一千”^{[38]卷6《皇恩龙锡耆士方启公先生实录》}，帮助徽商解决了燃眉之急。又如太平商人陈务烈，“年十九为徽商经理茶叶”^{[35]卷39《懿行传》}，后亦发家致富。此外，宁国商人与徽商在异乡共建同乡会馆的现象较为显著，这应是徽宁商人通力合作的重要表现。如乾隆十九年（1755），宁国商人与徽商在上海小南门外合资创建了徽宁会馆——思恭堂；嘉庆十四年（1809），徽州府六县和宁国府旌德县的商人在吴江县盛泽镇共建会馆，即所谓“徽宁会馆，两郡七邑所建也。”^{[39]355}另有记载：“徽宁两郡，本属同省，今又同邑经营……合成徽宁会馆，谁曰不宜。”^{[12]449}会馆在清代较为盛行，一般以同乡或同业为基础在京都或大商埠设立机构，以馆址房屋供同乡寄寓或同业聚会。徽宁商人在经商之地合建会馆，起到了商帮纽带的作用，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商业经营环境。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宁国商人与徽商有着相似的兴衰历程。宁国商人的足迹遍及省内外各地，他们的经营活动，促进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经商地区商业发展，有助于经商地区的城镇化乃至城市化进程；并自觉维护社会秩序，有助于社会稳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宁国商人具备“商帮”的诸多特征，而且从大量的文献资料可知，宁国商人与徽商之间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商业关系。随着徽宁二府的方志、家谱、文书、信札等地方文献的不断公布与发掘，徽宁商人在地方教育兴办、传播发展文化、社会公益事业、基层社会建设诸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这有待于进一步思考探索与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鲁铨，等. 嘉庆宁国府志[O]. 清嘉庆二十年刻本.

[2] 丘时庸，等. 嘉靖泾县志[O]. 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 [3] 王廷栋,等.乾隆泾县志[M].清乾隆二十年刻本.
- [4] 张瀚.松窗梦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5] 章潢.图书编[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 邱澹.琼台会稿[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 [7] 旌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旌德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2.
- [8] 陆再奇.宁国府商帮[J].志苑,2010,(4).
- [9] 江志伊,等.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O].民国十五年石印本.
- [10] 宣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宣城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
- [11] 宁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宁国县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12]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 [13] 刘洪谟.芜关榷志[M].合肥:黄山书社,2006.
- [14] 郑苏.厘金溯源与马头厘金局被捣毁经过[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泾县委员会.泾县文史资料选辑(二),1986.
- [15] 徐正荣.南京老徐源记茶栈[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泾县委员会.泾县文史资料选辑(三),1988.
- [16] 熊紫云.旌德古驿道纪事[C]//政协旌德县第四届文史资料委员会.旌德县文史资料:第二辑,1993.
- [17] 叶鹤年.商界鉅子——叶德松[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国县委员会编.宁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86.
- [18] 南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陵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4.
- [19] 李林.民国初期南陵城工商业简况及习俗摭拾[C]//政协南陵县文史办公室编.南陵县文史资料选编:第七辑,1988.
- [20] 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泾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
- [21] 胡毓玉.泾县乡土记[M].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
- [22] 陈祖荫,等.民国太平县志稿[O].稿本.
- [23] 吴坤修,等.光绪重修安徽通志[O].清光绪四年刻本.
- [24] 阮文藻,等.道光泾县续志[O].清道光五年刻本.
- [25] 朱珩.小万卷斋文稿[O].清光绪十一年嘉树山房重刊本.
- [26] 李瑾,等.乾隆旌德县志[O].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 [27] 陈炳德,等.嘉庆旌德县志[O].民国十四年旌德吕氏石印本.
- [28] 王椿林,等.道光旌德县续志[O].民国十四年旌德吕氏石印本.
- [29] 李德淦,等.嘉庆泾县志[O].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 [30] 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O].合肥:黄山书社,1993.
- [31] 上海徽宁思恭堂.徽宁思恭堂征信录[M].民国九年石印本.
- [32]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上海碑刻资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33] 廖大闻,等.道光续修桐城县志[O].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
- [34] 朱缝.张香都朱氏支谱[O].道光五年刻本.
- [35] 陈仁梅,等.仙源陈氏族谱[O].民国九年木活字本.
- [36] 朱家穆,等.旌阳凤山朱氏宗谱[O].民国八年木活字本.
- [37] 方镛.隐龙方氏宗谱[O].民国十年木活字本.
- [38] 方表,等.旌德方氏统修宗谱[O].康熙三十七年刻本.
- [39] 苏州历史博物馆,等.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G].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肖建新